

“在中国,科学家被誉为‘天空中最亮的星’,我这组作品命名为《天空中最亮的星》,也是想以此致敬科学家精神。”

董琪：用“国家名片”弘扬科学家精神

■ 潘树琼

得知自己的作品能“上天”时,董琪正在用画笔勾勒王小谟院士的眼睛。

“太不可思议了,特别不可思议,没想到真的能成功。”董琪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反复跟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确认。

“是的,董琪,你申报的这组作品可以搭载!”当电话那头一字一句跟她确认时,她才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

董琪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的邮票雕刻师,9月17日,她创作的一组雕刻版肖像作品《天空中最亮的星》,搭乘神州十二号载人飞船和三位航天英雄一起遨游太空90天后,与其他搭载物品一起返回地球。

“用‘国家名片’上的艺术语言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用我的专长和作品向科学家致敬,是我逐渐萌生且不断强化的愿望。如今,我终于圆梦了!”董琪看着工作室墙上的肖像画底稿感慨道。

与邮票结缘 用邮票致敬

董琪出生于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的年代,成长于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的时期。因为妈妈在邮局工作的缘故,小时候的她,时常在集邮柜台旁玩耍。

作为在邮局长大的孩子,董琪最喜欢那里的两个柜台,“一个是集邮柜台,剪邮票、分堆,花花绿绿的,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还有一个是报刊柜台,可以看书。”

与邮票结下的缘分,影响着董琪之后的求学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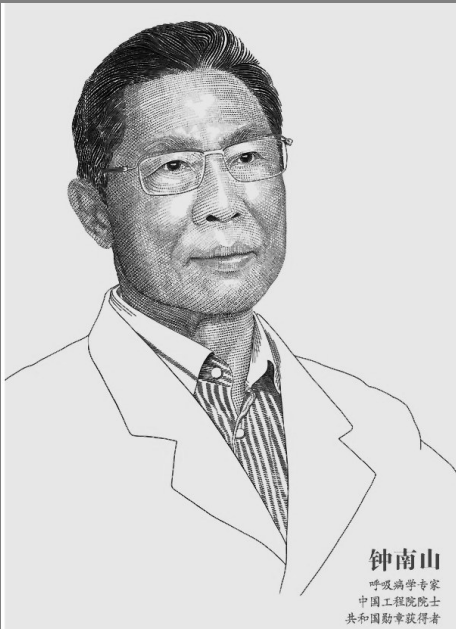
这次跟随载人飞船登上太空的《天空中最亮的星》,便是她在防疫封闭期间创作的三幅作品,作品的主人公分别是钟南山院士、屠呦呦院士和袁隆平院士。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切线下活动被按下“暂停键”。当时邮票国家队的多位优秀艺术家全力投入抗疫选题的创作中,董琪的设计方案3月12号中选《万众一心》邮资纪念封、明信片。

“完成《万众一心》后,我一直在思考,利用手中的这支笔,我还可以做什么?”这时,一个身穿白大褂奔赴在抗疫一线的形象闯入董琪脑海,从2003年的SARS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遭遇重大传染病风险,那个白大褂都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

“我可以给这些科学家创作雕刻版肖像画呀!邮票跟时事同步,既然我会,为什么我不能用我手中的笔和刻刀去表现自己国家的科学家呢?”想到这,董琪特别兴奋,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天空中最亮的星》三幅雕刻版肖像作品



“避免更多的感染,减少死亡,对于医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其实,用雕刻版肖像展现科学家的风采,也是科技与邮票冥冥之中的“约定”。雕刻版在所有绘画里应用得最为广泛,并且跟科学技术结合得非常紧密,雕刻版绘画的应用本身就是基于人类技术进步,又在记录人类社会发展。

“邮票被称为‘国家名片’,就像一部方寸编年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和发展,都会记录在册。”董琪解释道。

董琪选择的这三位科学家都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作为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彰显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他们不仅为中国更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科学家被誉为‘天空中最亮的星’,我这组作品命名为《天空中最亮的星》,也是想以此致敬科学家精神。”董琪认为,从战国时期的屈原“天问”到逐梦太空的“问天”,从对宇宙的感叹到对宇宙的探索,这是科学家们在追逐星辰大海。

用100个小时再现科学家的精气神

因疫情而萌生的创作想法,让董琪把第一幅画作锁定为85岁高龄依然逆行而上的钟南

山院士。

可问题来了,董琪并没真正见过这3位科学家,她所能找到的照片也仅限于网络渠道,但肖像画极为讲究人的神态,模糊的网络图片必然满足不了创作要求。

“画肖像,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董琪发动所有朋友帮忙提供高清照片,各个角度的都要,来者不拒,“要立体的,鲜活的,具体的。因为像不仅仅是容貌上的像,更是一种精神气质。”

画人难画骨,精神气质就更难表现。董琪在创作时有意寻找这3位科学家的个性。

“钟院士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座‘山’,有他在就很安心。”董琪选了钟南山身着白大褂的照片,既能体现他的职业特点,又给人以厚重踏实之感。在刻画他的眼神时,又着重以眼神光来表现,营造出他“看向你,又看向了远方”的氛围感。

第二幅画的主人公是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屠呦呦院士,她的身上有很多特质让董琪着迷和好奇,“屠院士非常执着,很认真。”所以董琪在创作时选了屠呦呦身着镂空毛衣的照片,展现她女性坚韧柔美的一面。

第三幅刻画袁隆平院士。在董琪看来,袁先生是深耕于土地的,他有着对土地的厚爱,因此他脸上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亲切和质朴感,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科学家,所以绘画时选择了他身着西装的照片底板。“袁先生的眉毛很难画,他的眉毛比较稀少,用点线表现的时候得考虑眉毛结构,就必须参考他年轻时候照片中的眉毛。”

“此绘画非彼绘画。”聊到这里,董琪突然笑了一下。走近那三张画会发现,画面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是由无数点连接起来的,它们并非一条完整的线。

“因为后期还要在钢板上雕刻,所以在画的时候就得用‘点’表现‘线’,为后期的刀刻做好准备。”董琪解释道,在表现点线关系时,要反复琢磨、反复思考,人物性格的特点和线条的刚硬和柔软要相符。

正因为工艺特殊,董琪创作这样一幅雕刻版肖像画需要100个小时左右,有时候半天的功夫也就刻了几根线,就几毫米的长度。

她拿出了自己的雕刻工具——那是一把传承了几代雕刻师已有100多年历史的钢刀。老师传给她时,她试着用小拇指顶刀柄特别劲,大小尺寸刚好合适,“你就是干这行

的。”老师很是欣慰。

钢刀刻钢板,董琪形容那种感觉就像“刻在一个很硬的木头上”。刀比钢要更硬一点,而她所用的钢板是没经过淬火的,硬度相对较低。

可以说,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工种。有时候着急想快点刻,啪,就戳到手上去了。因为是在方寸大小的钢板上作画,刀必须磨得非常锋利,“刀尖到什么程度呢?往指甲上轻轻一放,就扎进去了。”因此,在刻画过程中,董琪时刻谨记着“慢就是快”的原则。

由3到12,雕刻中国科学家群像

在创作钟南山、屠呦呦、袁隆平三位科学家的肖像画过程中,董琪逐渐萌生了给更多科学家创作雕刻版肖像画的想法,并且把科学家的故事记录下来,用雕刻画+文字的形式,为传播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出一份力。

“当时特别遗憾,本来跟袁院士约好去他家当面采访,时间都定好了。没想到……”5月22日,当袁隆平逝世的消息在董琪手机上弹出时,她一时难以相信,四处求证,想确认这是个假新闻。

也就在那一刻,董琪产生了想要抓紧时间记录的紧迫感。

“我怕来不及。也许大家都忘了,科学家是人,不是神。”在董琪看来,“人们理所应当认为科学家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带来新的科技难题的攻克,但忽略了很多科学家已经八九十岁了,他们常年或在实验室或在野外,有一天也会离我们而去。”想起这次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董琪眼睛里流露出后悔的神色。

这件事情也促使董琪想更多更快地去记录这些为国奉献的科学家们,“错过了袁先生,不能再错过其他科学家了。”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科学家,每一位都是国之栋梁。画谁?选多少个?是值得细细考量的问题。

董琪首先考虑的是不同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比如医疗、航天、国防等;其次是大家比较熟知且对这些领域比较了解的,比如钟南山、袁隆平等;然后是带一些科普性质的,等等。

反复思考后,董琪选择了包括钟南山在内的12位科学家作为她正在撰写的《使命——科学大家讲邮票里的中国故事》一书的创作对象,“他们身上有作为科学家的共性,比如心系人民,甘于奉献,纯粹童真,极其严谨又特别敢想等等特点,他们是国之栋梁的代表,是代表,不是唯一。”

为何选择12位?董琪解释道,我国自古就有十二生肖、十二时辰,这个数字代表的是轮回,是生生不息。

于涛：我家四代党员的红色接力

■ 口述:于涛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 记录:姚建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202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光辉时刻。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着和党风雨同行的难忘经历。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我家中的四代党员。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员人的初心和使命。而尊党爱党拥党就是我们家四代党员共同遵循的人生信条。

动荡的年代,共产主义改变了爷爷的一生

1921年12月,我的爷爷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市水头村一个贫农家庭,恰好与党同龄。爷爷11岁时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接受了最早的思想启蒙,初步地了解了共产主义思想,这是他很重要的人生际遇。19岁时,他又因参与印刷抗日书籍,被日伪军抓捕,在监狱里关押了三十一天。一同被捕的30余人中,有8人被确认是共产党员,最终遇难。这是爷爷又一次与共产党近距离接触。

过了几个月,因听说乡公所要再次抓捕他,爷爷一路逃亡到了朝鲜。在朝鲜期间,爷爷依然受着剥削、压迫。两年后,当他走投无路悄悄返回故乡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爷爷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人们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减租减息在进行,他同大家一样在政治上翻了身,爷爷第一次觉得这片土地是属于自己的。此后他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当年就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多年后我到了烟台工作时才了解到,即使在解放区,当时党员身份也是不公开的。

爷爷的亲身经历让他认识到,听党的话,跟党走,就没有错,这成了他一生的信念。之后了解放战争期间,他带民工支前,运粮、修桥……先是担任分队长,负责一百多人的小车队的管理,后来又转到中队任事务长,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

带队支前,爷爷的生活依然艰苦,但是他觉得这样的吃苦有意义。他在自传里记录过,在运送军鞋的时候,他的鞋破了,宁可光着脚也不动军鞋。最终,爷爷历时一年多,圆满完成任务,被授予二等功。

后来,华东局提出了民工队的政治工作方针是:“把

民工队当做学校办”,爷爷就在这个大学堂里迅速成长起来。一个苦难农民的孩子,能够成长为一名党员干部,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用爷爷自己的话说,“那完全是党培养和教育的结果。”

爷爷说,是共产主义改变了他的一生,赋予了他人生全新的意义。爷爷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家族史即国家史,一个家族的变迁折射出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变迁。

无论什么时候,父亲为百姓办事的心都未停歇

父亲1941年出生,1952年就跟着爷爷进了城。从小受村里老乡的照顾,父亲始终觉得自己是农民的孩子,不能忘了农民的疾苦。带着这种情感,父亲从没有为我们的事情托关系、找门路,而对向他求助的人,却有求必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

父亲是1964年在大学里入党的,党龄也已经满了50年。工作中,不时会有群众慕名找他反映问题。听闻他们不公的遭遇,父亲总是极为愤慨。我家先生和我妹妹都是学法律的,父亲总是要求他们无偿帮助这些群众修改申诉材料,指导他们按程序反映诉求。他对群众不忍心置之不理,只能全家总动员,努力多帮一点是一点。这些都让我深受教育,也成为我选择公务员作为职业的初衷。

退休之后,妈妈劝父亲修身养性,多锻炼身体。但读书的习惯已融入他的血液,所以依然如故。他重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观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问题,提出了很多鲜明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彰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良知。

父亲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我今年七十初度,理应以有限的绵薄之力奉献给社会。当有一天我要告别这个世界时,我也会坦然地回首平生: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直到他临终前两天,那时父亲已经神志不清了,断断续续说着胡话。我使劲辨别,原来在他混乱的意识里,仍然是有人找他申诉不公。他气息微弱地说:“我太累了,撑不住了,你替我去帮帮人家。”我明白,这是他的心事,他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放下人民群众,他为百姓办事的心永远都不肯停歇。

时不我待,我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作为女儿,我对父亲心怀敬意,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2015年1月,我被派到地市工作,终于有了直接为群众做事的平台。六年时间,我在两个市任职,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去过几百个村。我经常利用周末时间自己开车到村里,到老百姓家里坐坐。我的手机里也存着很多基层干部群众手机号码,他们有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工作时中,我也总是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建议。

我忘不了小时候,经常有农民进城要饭,父亲不仅有求必应,更是把他们叫进家门,和我们同桌吃饭,借机了解农村的情况。父亲总是跟我说,农民的幸福关系着国家的发展,一定要关注农民,珍惜农民。能到基层真正为农民做事是父亲的愿望,可惜他始终没有机会实现,而这成了我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情感基础。如果父亲看到我替他完成了心愿,找到了让群众共同富裕的好路子,他该多么高兴啊。

我总是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我的祖父、父亲都已经去世了,如何让这些亲历者把真实的历史保留下来,让年轻一代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这是父亲未完成的遗志,也是我作为党员干部责无旁贷的职责。

所以,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系统挖掘、保存、整理胶东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建成党性教育基地十几处,系统展示了古代兴盛—近代屈辱—革命建设—走向复兴的完整脉络,以此教育党员群众和青少年,我们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建党百年,双胞胎儿子先后入党

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与马克思同一天生日。我在院子里修了一座旗杆,每天早晨带领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儿子三岁的时候就会背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时候,孩子们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建成一座高楼,让天下无家可归的人都住进来。

18岁的时候,他们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急切地希望成为我们家第四代共产党员。

我用小长假带他们去了胶东党性教育基地等几个教学点,亲自给他们当解说员;我用春节和中秋两个团聚的节日,跟他们一起开了两次家庭民主生活会,一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次开展表扬与自我表扬;我带他们在党性教育基地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假期周末,

我经常带他们一起去农村调研,倾听农民疾苦,帮村里解决困难。

疫情期间,他们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家上网课。我们全家每周三个晚上,用视频连线的方式一起读《毛泽东选集》,读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每次一个人做轮值班长,主持读原文和交流心得体会。而白天,他们则在学习之余,到社区去做志愿者。

19岁时,两个儿子几乎同时成了入党积极分子。2020年8月和10月,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一起在建党百年前夕,在20岁的年纪,成了我家第四代共产党人。从此,他们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同志。

传承红色基因,需要不断锻造自己。爷爷那一代人为建立新中国流过血,父亲那一代人为建设新中国流过汗。现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在继承遗志,接续奋斗。

愿党的事业生生不息,愿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于涛(中间一排左一)和家人在一起合影